

## 《佛國記》西譯研究與傳播（一）

許尤娜

法顯及《佛國記》自唐代之後，罕見漢文稱引，宋明清三代僅得兩位文人品鑑。然而十九世紀卻在「西方歐陸，得到第一代學院漢學家高度看重，以法譯和英譯方式出版問世。釋法顯在五世紀初完成十五年陸去海還的天竺朝聖，對一千四百年後、意欲丈量世界的歐洲學者而言，依然是一種「古今罕有」的人類極限經典；歷劫歸來後寫成《佛國記》，經過時間淬煉，終被另一個文化肯認為無可取代的人類文明遺產。

一八一五年法蘭西學院設立漢學教席，聘任自學漢語成果驚人的雷慕沙為第一位漢學教授。自此，「漢語」正式被納入學術領域，在學院之內以系統性方式被傳授與被學習。雷慕沙以其漢學興趣和多語專業，在獲得法顯《佛國記》中文文本之後，立刻興致勃勃積極投入研究。以雷氏為首，法蘭西學院建立師徒相承學風，在短時間內完成中世紀三位求法漢僧「天竺朝聖行記」的法文譯注，為歐洲學界揭開漢語文明的神祕面紗，更為歐洲佛學研究者，開啓「漢傳佛教」新視閥——在南傳

巴利文佛典之外，還存在著由梵轉漢的北傳佛教經典。《佛國記》儼然嫁接了十九世紀「歐洲—印度—漢地」三地的「佛教」對話與研究。

五世紀漢文《佛國記》，在十九世紀跨越萬里「西遊歐陸」的事實與現象，突顯了哪些「中國視閥」忽略的特性？是否反映出近代歐洲的特殊時代處境與精神面貌？西方科學觀點下，漢學家從《佛國記》看到、發掘到什麼樣的內涵？如何啓發導引「中文」學界的自我觀看視角？面對法、英、德近二百年的法顯研究成果，中文學界是否宜有適切回應？生長於漢傳佛教文化土壤上的中文研究者，如何善用古典漢學與大乘法義優勢，綜理中西二百年研究成果，為法顯及其《佛國記》，作出恰如其份的詮釋與評價？

筆者欲盡可能周延回答上述提問，然而限於學力和篇幅，所作仍處於起步階段。在這篇文章中，試圖將文本置於中西文化交流視野，全面整理法顯《佛國記》兩百年來的西譯研究，展示《佛國記》在歐陸透過學術被

理解、被接受的歷程。先略述歐洲漢語學習與漢學研究歷程，簡介法蘭西學院首位漢學教授雷慕沙對漢學的貢獻，論述其《佛國記》法文譯注如何結合漢學與佛學。後依時間先後，次第討論《佛國記》法譯、英譯與德譯三種西語的譯注研究，突顯不同譯者的譯注特色。限於篇幅與學力，借重各譯者書前〈序言〉、〈導言〉，摘述重點，指出兩百年來歐洲漢學家如何選擇本文相關材料、如何在形式與內容表現其翻譯旨趣。

## 壹、歐洲漢學與漢傳佛教研究

### 一、從傳教士漢學到學術化漢學

#### （一）始於傳教之需的漢語學習

自十六世紀中葉，因商業與傳教之需，歐陸展開對「漢語」的興趣與學習。<sup>1</sup>

中國與歐洲文化之真正接觸，始於「大航海時代」，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東航而來。<sup>2</sup>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（一五五二），葡萄牙人入據澳門；萬曆十年（一五八二）前後，開始合法長期租住從事貿易。與此同時，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入華傳教。其中，「天主教」耶穌會（Compagnie de Jésus）傳教士發揮核心

作用：在范禮安（Alexandre Valignani，一五三八—一六〇六）的傳教方針下，傳教士羅明堅（Michel Ruggieri，一五四三—一六〇七）和利瑪竇（Matteo Ricci，一五五二—一六一〇）成為西方最早的漢學家，促成西人學習漢語的第一個高潮期。<sup>3</sup>

史傳最早東來傳教的耶穌會士為方濟各·沙勿略（S. François Xavier，一五〇六—一五五二）；但耶穌會遠東傳教最重要的策略，卻是范禮安所提出：在華傳教「最重要之條件，首重熟悉華語」。<sup>4</sup> 他安排義大利人羅明堅及利瑪竇學習漢語，兩人進而成為西方最早的「漢學家」。<sup>5</sup> 羅明堅以漢語布道，並排除萬難成立「聖瑪爾定」語言學校；後來一五九四年成立的聖保祿學院（Colegio de S. Paulo）甚至將漢語列為必修。而利瑪竇一五九五來華，採取「合儒排佛」態度，適應、尊重儒家文化。兩人一返歐陸一留華地，合力將范禮安的傳教理念付諸實踐，促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所謂「西人學習漢語第一個高潮」。

西人漢語學習第一個高潮表現在四方面：第一，穩定的教學機構和漢語教材，如利瑪竇將《四書》作拉丁文—漢文對照，提供入華傳教士學習中國文化。第二，入華耶穌會士著手中譯西方文獻，如利瑪竇與徐光啓

合譯《幾合原理》最爲代表。第三，入華傳教士開始中文著書，如利瑪竇中文著述有二十四部，其中有十三部甚至收入《四庫全書》；而乾隆禁教之前入華傳教士，亦多能以中文寫作。第四，編輯漢語辭典和語法書，如羅明堅與利瑪竇合編《葡漢辭典》，雖未出版，但卻是第一部漢外對照辭典，亦是首部拉丁文字母與漢語對照辭典，不但對歐人習漢語占重要地位，亦對研究漢語拼音史有重要意義。語法書方面，第一部爲多明我會修士萬濟國（Francisco Varo，一六一七—一八七，又名瓦羅）以西班牙文編寫的《華語官話語法》（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）；<sup>6</sup>但就系統性而言，首部成功的漢語文法書，則屬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（Joseph-Henri-Marie de Prémare，一六六六—一七三六）在一七二八年於廣州寫成的《中國語言志略》（Lingue Sinice，又譯《漢語札記》）。此書將漢語區分爲文言與白話，奠定了近代漢語語法研究之基礎，但卻塵封於巴黎皇家圖書館一百年，十九世紀初經雷慕沙發現，一八三二年才於麻六甲出版。<sup>7</sup>

由於「禮儀之爭」，天主教在華傳教受清廷嚴控；<sup>8</sup>加上雍正、乾隆兩朝明令「禁教」，天主教耶穌會在華影響力日益式微，二百年熱烈的中西交流場面亦暫

告段落。<sup>9</sup>十九世紀爲中西文化交流開創新局面者，轉爲「基督教」新教傳教士。

## （二）對漢語語法的探索研究

相對於入華傳教士自十六世紀在漢地展開漢語學習，歐洲本土文化界的漢語學習顯得起步甚晚。<sup>10</sup>漢文方塊字第一次出現在西方書籍，是西班牙傳教士門多薩（Juan Gonzalez De Mendoza，一五四五—一六一五）的《中華大帝國史》，一五八五年首版於羅馬；<sup>11</sup>然影響較大者爲基爾歇（Athanasius Kircher）《中國圖說》（China illustrate，一六六七），書中首度公布中國一些象形古文字，引發歐陸文化界廣泛興趣。他並將《大秦景教碑》碑文編成拉丁文—漢文對照的詞典，含發音及詞義，被視爲歐洲人學習漢語首部「拉—漢詞典」。

漢語研究方面，英人韋伯（John Webb）透過閱讀傳教士著作，首度將漢語放入世界語言研究範疇，其著作《論漢語之爲人類原始語言的可能性》（An Historical Essay Edeavou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，一六六九），提出漢語是人類「原始語言」觀點，在歐洲思想史具有一定地位。德國方面有米勒（Andreas Müller，一六二〇—一六九四）在著

名的《漢語奧秘》（*Proposito Clavis Sinica*）宣稱已找到學習漢語之鑰，可很快讀懂漢語：哲學家萊布尼茲（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，一六四六—一七一六）因此多次與之透過書信討論。<sup>12</sup> 另，俄國巴耶（T.S. Bayer，一六九四—一七三八）亦嘗試研究漢語文法文獻。<sup>13</sup>

雖然歐陸自十六世紀陸續得到傳教士寄回的漢語資料，但至十九世紀初，歐洲學界仍普遍認為「漢語是一種沒有語法的語言」。<sup>14</sup> 前述一七二八年馬若瑟手稿《漢語札記》於一八一五年才被雷慕沙重新發現並正式引用。在此之前，歐洲學界對漢語可謂仍停留於文字論述而無語言分析；<sup>15</sup> 萊布尼茲甚至說過，漢字好比是「聾子發明的文字」。<sup>16</sup> 可見直到十九世紀初，歐洲對「漢語」及其語法仍十分陌生。

一八〇七年倫敦傳教會派遣馬禮遜（Robert Morrison，一七八二—一八三四）來華，是新教來華布道先驅。<sup>17</sup> 他在倫敦已自學中文，來華後復自學粵語與中國官話；並在一八一八年於麻六甲創辦「英華學院」，<sup>18</sup> 傾力培育東來傳教士。英華學院不但是基督教傳教士開辦的第一所中文學校，後來亦成為中國近代教會大學之先河。著作方面，馬禮遜於一八一五年出版英文版《漢語語法》（*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*）：

復於一八二三年出版三卷本《華英字典》（*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s*，一八一五—一八二三），是中西史上首部公開出版的英漢對照字典；後又於一八二八年出版英文版《廣東土話字匯》（*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*）。

馬禮遜入華，代表西人漢語學習的第二波高潮。此時期透過辦新式學校、重編漢語教材、著譯中西著作、創辦中文報刊等，在中西文化交流之廣度、深度與力道，都大大超越第一波。來華新教傳教士經過長年在華生活，對中國文化有超越前人的生活經驗與同理心研究，使他們後來多成為學術專業的「漢學家」。其中，英國傳教士理雅各（James Legge，一八一四—一八九七）在華三十年，傳教之餘，對中國典籍進行深刻研究，畢生將中國儒、道兩家思想的重要典籍——四書、五經、老子、莊子進行英譯，引介給西方世界，奠定其在十九世紀西方漢學史上的地位；返英後就任牛津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。<sup>19</sup> 一八八六年七十歲時，出版其學術研究代表作——法顯《佛國記》英文譯注，恰是雷慕沙法文譯著出版後半世紀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

1. 關於本文第一節「歐洲漢學與漢傳佛教研究」議題，筆者曾有論述，這裡略作修正引述之。參見拙作，〈歐洲佛學研究新視閥：雷慕沙《佛國記譯注》〉，收於學愚主編，《佛教思想與當代應用》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二〇一五，上冊），頁三一七—三四七；特別文中第一節。

2. 葡萄牙人透過航海開啓了遠東的探險和發現。一四八八年迪亞士 (Bartholomew Diaz) 到達非洲好望角，發現印度洋；一四九七年航海家瓦達科·達·伽馬 (Vasco da Gama) 越過好望角；一五一〇年攻陷印度西岸臥亞府 (Goa)，作為遠東根據地；一五一一年攻占中國附國滿刺加 (今馬六甲)，以此眺望太平洋。參見張西平，《對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的研究——兼論對外漢語教學史的研究》，《漢學研究》，二〇〇一年第七集，頁三九七—四二二。

3. 主要參考張西平，《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二〇〇一）；以及張西平，《對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的研究——兼論對外漢語教學史的研究》，頁三九七—四二二。

4. 費賴之著，馮承鈞譯，《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五）上冊，頁二十一。

5. 參見張西平，《羅明堅——西方漢學的奠基人》，《國際漢學》，二〇〇一年第三期，頁一〇—一一五。

6. *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* 一七〇三年在廣州以木刻出版，開漢語語法研究先河，有重要性；但真正探討語法則不到三十頁，且全書無一漢字，故實際影響不大。參見（丹麥）龍柏格著，李真、駱潔譯，《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研究》（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），頁二。

7. 雷慕沙在傅爾蒙《中國官話》(Etienne Linguae Sinicae) 得知此書，積極尋找，如獲至寶，立即手抄該書，深入研究大受啓發，在一八二二年出版的《漢文啓蒙》中盛譽之。後透過馬禮遜努力，終於在一八三一年於麻六甲首次印行；一八四七由裨雅各 (J.G. Bridgman) 譯為英文出版。關於馬若瑟《漢語札記》的漢學地位與一生重要成就，參見（丹麥）龍柏格著，李真、駱潔譯，《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研究》；特別是第十章「馬若瑟的身後事」。另可參見張西平，《對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的研究——兼論對外漢語教學史的研究》，頁三九七—四二二。

8. 參見李天綱，《中國禮儀之爭：歷史·文獻和意義》

- 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八）。
9. 參見楊森富，《中國基督教史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）特別是第九章。另可參考白晉著，馮作民譯，《清康熙兩帝與天主教傳教史》（台北：光啟社，一九六六）。
10. 參見張西平，《對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的研究——兼論對外漢語教學史的研究》，頁四〇八—四一二。
11. 參見（西）門薩多著，何高濟譯，《中華大帝國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八）。
12. 參見許明龍，《歐洲十八世紀的「中國熱」》（山西：山西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九）。
13. 參見張西平，《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二〇〇一）。
14. 以基爾歇（Athanasius Kircher）為代表的語言學派，認為漢字乃從埃及象形文字所派生，其拉丁文著作《中國圖說》（*China illustrata*）於一六六七年出版，很快被譯為荷蘭文、英文與法文。直到一八二二年商博良（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）辨讀埃及象形文字後，才結束此學派說法。參見張西平，《對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的研究——兼論對外漢語教學史的研究》，頁四〇八—四一一。另杜邦索（Peter. S. Du Ponceau）於一八三八年在美國費城發表〈論漢語寫法系統的本質和特點〉，被視作是關於漢字研究的第一篇現代性綜合論述，他認為漢語「極少甚至沒有語法形式」（has but a few or no grammatical form），並稱漢語為「沒有句法的」語言，而所有其他語言則為「分析性語言」。參見《美國哲學學會歷史及文學委員會學報》第一卷，頁三三五—四四八。以上間接引用自（法）艾樂桐著，張冠堯譯，〈歐洲忘記了漢語卻「發現了」漢字〉，收在龍巴爾、李學勤主編，《法國漢學》第一輯（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社，一九九六），頁一八二—一九八。
15. 雷慕沙與德國洪堡（Wilhelm von Humboldt）書信討論中，曾云「長期以來，人們認為漢語沒有語法，因為它沒有詞法，或者只有一種『原始的』語法。但從十九世紀初葉起，在辯論語法和語言與思維關係的本質時，這種語言卻成了試金石」。參見（法）艾樂桐，《歐洲忘記了漢語卻「發現了」漢字》，頁一八二。
16. 此看法後來有所修正。參見（法）艾樂桐，《歐洲忘記了漢語卻「發現了」漢字》所引馬德萊娜·V·大衛（Madeleine V. Davia）《十七及十八世紀有關文

- 字和象形文字之爭與辨讀概念在死文字上的應用》（巴黎高級研究實驗學校出版社，一九六五年出版）。一七九二年基督教新教先驅威廉·凱里成立第一個海外傳教組織——浸禮宗廣傳福音會（The Particular 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on the Gospel Among the Heathen）；接著是倫敦傳教會（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）；而後一七七九聖公會海外傳教組織——英國傳道會（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）成立。美國方面，一八一〇年
- 公理宗教師成立美國（公理會）海外傳道部（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），一八二九年派裨治文（Elijah Coleman Bridgman）來台，展開美國在華持續百年的傳教。
18. 英華學院一八一八於麻六甲開辦，一八四三遷往香港，一八四四年更名英華神學院，一八五六年停辦。
19. 參見（美）吉瑞德著，段懷清、周俐玲譯，《朝覲東方：理雅各評傳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，二〇一一年）。

## 日本佛教盆踊舞宜蘭大學再現

【本刊訊】宜蘭大學林蔭大道五月七日，有近百名師生穿著日本服飾，大跳「盆踊舞」，隨著輕快的炭坑調舞動肢體，這項新鮮難得體驗，讓學生從穿衣到舞蹈過程體現日本文化。該項活動，是由外國語文學系日文老師洪若英與學生發起舉辦「歡跳吧！青春時代·日本盆踊大會」。包括台北口語老師、空大老師得知前來參觀，也有蘭陽女中學生參與。

「盆踊」是日本盂蘭盆節時，眾人聚集，跳的一種舞蹈，專注於手部動作，原本是一種佛教儀式，在隋唐

時代經由僧侶傳到日本，與當地民俗結合，成為獨特的祭典形式，通常搭配炭坑小調演出。

學生把穿堂布置的充滿東洋風，在著裝完畢後，眾人集合往林蔭大道出發，三人一排大跳盆踊舞，沿路吸引很多師生觀賞，拍照。

發起來洪若英老師表示：學生上日文課、了解日本文化，都是書本上東西，為了這次體驗，她事先租借服飾，希望讓學生從布置會場、穿衣到舞蹈，從做的過程中感受日本文化與做事態度。